

一提起山东的宣传口号，最著名的就是那句“一山一水一圣人”了，山指的是五岳之尊泰山；圣人说的是万世师表孔子。至于水，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角：黄河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但是我们这位“母亲”脾气却不太好，经常发脾气，耍性子，具体表现就是频繁的洪水和不停地改道。就拿黄河入海口来说，就没有固定过，据史料记载，黄河最北曾经夺过海河的河道，从天津入海；最南曾经占领淮河的河道，从苏北入海，至于从山东东营入海，则是黄河距今最近一次改道的结果。

### 黄河改道出现闯关东潮

1855年，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，改道北流，分几股水穿过山东的腹地，当时正值清朝政府忙于对付太平军之时，无力堵塞，遂造成了黄河北徙改道大清河入海。铜瓦厢决口改道是黄河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，它结束了长达七百年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的局面。在随后的二十年间，黄河在铜瓦厢到山东阳谷张秋镇一带频繁移动，所到之处，遍地泽国，一直到1884年黄河堤坝修好之后，才形成了如今的河道。

稳定后的黄河，流经山东菏泽、聊城、泰安、德州、济南、滨州、东营七个市，因为这些地方都遭受过黄河洪水的侵袭，所以被人们称之为“黄泛区”。

在过去，“黄泛区”的人民生活是非常困苦的。黄河洪水的到来，不仅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，还将所到之处的自然环境摧毁殆尽。黄河洪水及其所携带的泥沙，破坏了山东平原地区的自然面貌，毁坏了植被，造成了水系紊乱，河湖淤积，削弱了泄洪能力，在平地上留下了大片沙地、沙丘和岗地、洼地，恶化了当地的气候环境。

如在1898年，聊城东阿附近的黄河北堤决口，洪水滔滔，在东阿县形成了一个大湖，延伸的湖面都到了北边的茌平县，淹没了无数农田。由于黄河水的含沙量极大，“一石水，六斗泥”，所以洪水退却之后，大量良田严重沙化，根本没有办法种植粮食，人们不得不废弃。

本来山东就人多地少，不堪重负，黄河洪水的泛滥，更是将山东人勉强维持的生活彻底冲垮。为了能生存下去，山东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将目光投向了一海之隔的东北。他们不顾清政府的禁令，钻山林、涉河流、挨饥饿、斗野兽、避土匪……突破重重险阻，最终来到了关东大地。

这些从山东过去的农民，刚开始进入东北地区时，很多人都被迫从事重体力活，所以不受当地人待见。但是山东人秉持着“回家也是死，在这里还能活”的信念，顽强地在东北扎下根来，并繁衍至今。

### 京杭大运河遭没落

在铜瓦厢决口之前，山东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是大运河沿线的德州、临清、聊城、济宁、枣庄。

自从靖康之变之后，中国的经济中心就变成了东南诸省，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一跃成为中国最繁忙的“黄金水道”，以清朝为例，每年北上南下的漕运船约六七千艘，最多时可到一万艘，平均每年运输的漕粮达400万石，供京师驻军和皇室百官食用。

可以说，运河漕运是维系国家生存的命脉，运河沿线的城市，也因来往不断的漕运船，商业逐步兴盛起来。

很不幸的是，1855年黄河的改道，直接让德州、临清、聊城变成了黄泛区，济宁以北的河段因洪水侵扰，完全阻塞，无法通行。加上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，无力治理运河，漕运逐渐就变成了海运。

大运河漕运的衰落，直接导致周边地区经济衰落。曾经号称“天都之肘腋”的聊城和“繁华压两京”的临清，经济大幅度衰退，资料记载，“运道浅阻，日甚一日……河运遂停。停运之后，河身日渐浅涸，仅东昌（聊城）、临清间有小舟来往，商业大受影响。”后来，清政府完全放弃了漕运政策，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功能完全丧失，因漕运而兴盛的临清、德州、聊城等地经济形势全面恶化，基本上见不到商业的影子，“满目劫灰，元气不复”。

济宁以南的运河河段虽没有受到波及，但经济情况也大不如前，“八省大漕已不行，视前所谓市杂荆吴客者，已觉其寥落”。

在这里再多说一句，同样因黄河改道而没落的还有利津，作为大清的尾间，利津一直是山东重要的盐场，繁荣了九百多年，产量居山东各盐场之首。黄河夺大清河河道之后，因海潮大作以及改道而来的黄河屡次决口，利津盐滩淹没殆尽，至1894年，原有的480副滩池，仅剩60副幸存，盐业就此一蹶不振。

### 山东官员打了20年黄河流向官司

可以说1855年的黄河改道，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楚。

对于这个“不速之客”，齐鲁大地的百姓难言喜欢，当时大家就有一个愿望，希望黄河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。

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，他会同漕运总督文彬联合上书，力主黄河复归故道从淮河入海。

虽说这个建议得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的支持，但是禀报朝廷之后，并没有得到皇帝的同意。

后来，山东的官员又提出了分流说。1883年，黄河泛滥严重，山东巡抚陈士杰提出开马颊河以分减黄河洪水。因为马颊河流经河北大名，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，直隶(河北)地处上游，黄河流经只有一隅之地，黄河决溢为害不大，但如果开马颊河(流经河北大名)，黄河就有可能在河北决口，因而以地势和民情不宜为由极力抵制。

看着原本的盟友变成了“敌人”，山东官员不得不放弃了“分流说”，重提黄河复归故道从淮河入海的老调。

可依然有人说。不。最坚决反对山东官员主张的是江南的官员，这些官员因为人数多，品阶高，在清政府内部逐渐占到了上风。其中以江苏人、户部尚书翁同龢为代表。1887年，黄河再次决口，淹没山东大地的同时，威胁漕运安全。为此，山东巡抚再次上书，请求朝廷赈灾的同时，再次提出让黄河复归故道从淮河入海以保护漕运的建议。翁同龢和他的江苏老乡、工部尚书潘祖荫随即拟就《请筹堵郑州决口并设法补救疏》，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帝，历述黄河复归故道有“二大患”和“五可虑”，称为保全漕运和课盐之计，“现在水势断不能入黄河故道”，否则“东南大局，何堪设想”。

老师翁同龢的话对光绪帝有重要的影响。他随后颁下谕旨，大力称赞翁同龢的上书，并指出山东巡抚所言的黄河复归故道有诸多不利条件，不可能将黄河复归故道。

随着这道谕旨的发出，这场长达二十余年关于黄河流向的争论才暂告平息。



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7月14日，“中国植物画第一人”曾孝濂国内个人专题画展亮相昆明，130幅自然绘画作品展现了植物世界的丰富多彩和美丽精妙。

梭罗说，“大自然经得起最细致的观察”。而曾孝濂不仅是大自然的观察者，更是一位极具恒心的记录者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他四十年著一志，和同仁一起编纂出80卷、126册的《中国植物志》。可以说，曾孝濂有着标准的“斜杆”人生：他是画师，也是工程师；是研究员级的科学工作者，也是画家。

植物科学画相当于植物的“身份证”，这种专业形象的手法表述，比文字更准确，好的植物画与发表新物种的模式标本同等重要。难怪有人认为：“如果说摄影能够记录瞬间，那么科学绘画记录的就是物种的永恒。”

在今年第二季的《朗读者》舞台上，很多人见识了曾孝濂惟妙惟肖的画功，而在此之前，曾孝濂在邮票收藏者中已是相当出名。《杜鹃花》《杉树》……从1991年到2008年，曾孝濂设计的9套邮票，数次获得年度全国最佳邮票奖。2008年，6枚《中国鸟》邮票还获得第十三届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最佳连票奖，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次获得该奖项。集邮迷这样评价曾孝濂画的邮票：他设计的动植物邮票，都是采风后一笔一笔画出来的，没有一件是在电脑上捣鼓出来的，正因如此，他设计的邮票不仅具有科学性，而且具有东方绘画特有的神韵。

曾孝濂不是科班出身。1939年6月，曾孝濂出生于云南威信。少时的他，是“信手涂鸦一顽童”，十来岁时就比着毛主席像临摹，“胆子大，但画得不像”。不过，曾孝濂后来的画作却很讲究“像”，或者说是讲究精确。无论是早期的科学著作插图，还是后期的花鸟艺术创作，都做到“无一花无出处，无一叶无根据”。

1958年，曾孝濂高中毕业，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招录，职务是见习绘图员。对自幼爱好涂鸦的他来说，能从事与绘画相关的工作，比考取大学还要高兴。适逢第二年《中国植物志》立项，需要大量画师。于是，曾孝濂就“机缘巧合入画途”，这工作一做，就是四十多年。

作为全世界最大型、种类最丰富的植物学巨著，《中国植物志》全书近5千万字，前期将种子植物的资料整理入库并建立档案，就用了5年时间。曾孝濂几十年来绘制的植物画加起来超过了2000幅，老先生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：“标本是蜡叶标本，有的比我的年龄还大，但我在画的时候就把它画活，去野外、植物园找很多参考，到图书馆去翻很多书。当我潜心观察，画写真时我就好像能倾听到它的喃喃细语，把它诉说的画出来，我就觉得一点都不辛苦。”

为了准确描绘出植物的形象和特性，曾孝濂经常深入高山丛林。有些习性特殊的植物如绿绒蒿，只生长在海拔3000-5000米的高山上，曾孝濂只能在缺氧状态下完成绘画。而一旦进入山区，又会遭遇蚂蚁、蚂蟥、马蜂、马路虱子这“四兄弟”的“关照”。曾孝濂曾回忆，自己最多的一次胳膊上有42个伤口，意味着被42只蚂蟥叮咬，渗出的血甚至直接把衣服和皮肤粘在了一起。

大量时间与自然相处，渐渐改变了曾孝濂。有几年出差，“每天在大山里面，天不亮，你就听那鸟叫吧。就是一个交响乐、大合唱。你分不清也看不清什么鸟。在西双版纳，在易门，林子里天快亮时都一样。就特别想画”。就这样，曾孝濂建立了自己的绘画语言，不像早期的本草绘画，仅凭借药用部位或者大概的外部长相来描绘，也不是简单重复相机的功能，除了画得像，更要表现这个物种的生命状态。



“从无知开始，兴奋、惊喜、震惊，然后就有点敬畏，再后来就知道大自然是生命的合唱，这里的物种经过千百年的进化，既有竞争，又相互依存，是大的生态网。身处其中，你会觉得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。”想不到，艰苦的野外作业任务竟在哲学层面训练了曾孝濂。

“画博物画要耐得住寂寞，甚至有时候是孤独的。我觉得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特别重要，孤独的时候进行的思考，最清晰，最有效。绘画是一种个体劳动，在个体劳动的过程中，如果你觉得很寂寞的话，当你适应了，会觉得是一种享受。”

虽然植物科学画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，但随着数码电子技术的发展，它渐渐变得不再那么重要。中国植物科学画的鼎盛时期就是在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编撰时期，全国三百多位植物分类学家，一百六十多位画师，全部集中来完成这项工作，而《中国植物志》一完成，就进入了低谷。据说如今从事这个职业的已不到10人。

上世纪90年代曾孝濂退休后，他的身份更像一名画家，“我要抢时间，把我想画的景观、树、生态环境补出来，还有鸟类，我们到西双版纳每天天亮时听见上百种鸟叫，不知道是哪种鸟，看它怎么做窝，怎么跟蛇打架……这些在工作时没时间画，所以我一辈子都在跟时间争分夺秒。”

这让人想起曾孝濂先生在自己的《百花图》出版时写过的一段话：“我不期盼人人都喜欢这些画，但愿看画的人能关爱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，它们和人类一样应该拥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力。”这种对物种最自然最原始的关爱，大概就是他为之付出一辈子努力的初衷。

【人物志】

## 『中国植物画第一人』曾孝濂

□本报记者

徐静

【短史记】

## 黄河改道：火了闯关东，凉了大运河

□本报记者

朱文龙